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之三

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讨论综述^{*}

袁 银 传

历史进步及其评价问题是过去国内唯物史观研究中关注较少的问题之一。人们在谈论和研究社会进步时虽然也涉及到了历史进步,但往往是把社会进步与历史进步等而视之。随着人类时间观念的强化和时间方法的突出,人类文明和文化进步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更长的时间过程中来加以研究和评价,在这种意义上,提出并深入研究历史进步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武汉大学哲学原理博士生指导小组的部分教师和博士生们围绕着此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具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 ①历史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 ②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与生产力标准;
- 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

一、关于历史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问题

博士生姚军毅首先发言指出,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或曰承认存在历史进步,是唯物史观的基本信念之一。指导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实现历史进步,是唯物史观建构的旨归和价值所在。国内唯一对历史进步进行了考察和专门论述的哲学教材只有肖前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修订本,专题研究历史进步的文章几乎没有。这种状况既令人惊异,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应该说,虽然人们很少对历史进步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但问题本身并非没有被注意到,不过是在社会进步的名义下被注意到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历史必定是社会历史,脱离社会人们便无法谈论历史,社会和历史难以界分,才出现了在社会进步名义下谈论历史进步的状况。其实,社会和历史是可以相对区分开的。虽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社会历史阶段,但仔细推究一番便不难发现,当人们描述、研究人的活动时,在共时态意义上,即限定在特定社会形态的范围内和放在一定时间区段上时,就用“社会”范畴。在历时态意义上,即不局限于某一社会形态和放在相当长的时间区段上时,就用“历史”范畴。据此,并根据通常被归入社会进步范畴的社会变化、发展有量变——社会形态不变前提下的社会变化,和质变——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社会变化两种,把社会进步——社会形态不变前提下的社会变化,与历史进步——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变革相对区分开来,是完全可

* 参加本次研讨课的有陶德麟教授、欧阳康教授、汪信砚教授、肖中舟副教授、博士生吴宁、姚军毅、袁银传、肖诗美、赵凯荣、陈芳、学报彭昌林等。

能的。这里的要点是以人的活动方式切入,总体活动方式未变前提下的局部、具体活动方式变了,由低级进到了高级,是社会进步;总体活动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嬗变,是历史进步。

博士生赵凯荣对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这两个概念作了详细的区分。他认为,社会与历史不同,因而才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科区分。社会学的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对社会的研究偏重于个人及共时性,而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则是历时地改变着的一切。区分社会的发展与历史进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来是绝对必要的;其一,社会的研究将自然关系摆在一边,或者以人为参考系,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人为自然的征服者,将人和自然相对立(人为自然立法)。而历史则将自然视为母亲和根,社会只是其孕育的子女,社会从自然中产生,最终还要和自然这一永恒的源泉认同和复归,达到天人合一。这里除了人的尺度外,还有一切自然权利的尺度,除了生命的权利外,还有生态的权利。其二,正由于社会同自然的这种关系,决定了社会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文明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了人将自然视为外在的异己力量加以征服、改造的努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以创造“缺乏的东西”、“形成整体”(马克思语)的方法创造了大量外在于人的东西,这种新的外在自然从两方面发生作用,一方面内化为社会的因素,加速人与自然的协调化,另一方面外化为对立社会的力量,产生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与之相异,历史的进步则是一个文化的尺度,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概念。其三,社会发展的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强化了这一点;而历史进步则在于人的解放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从关于资本主义对人的关系中得出的。其四,社会的发展遵循生产力标准以人为唯一的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单方向、不可逆的、递增的、一级为一级基础的、连续性的社会发展运动。但历史则更多显现变化的态势,不一定单向,有时会双向,甚至后退(复辟、回归、可逆),有时不连续而跳跃。特别是,历史进步更主要是一个生态概念,不能为了人的利益将矿产、能源、动植物统统消灭,因为自然的历史演进系统也是历史进步的一部分,除了根、归宿的意义外,也是人的内在需求。这样,人的解放就有几重规定: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人与社会体制的解放(经济、道德、法律等)、人的阶级解放、人的体智解放(特别是残废人、妇女儿童)、种族解放、宗教解放等诸多内容。其五,社会的发展重在经济形态,而历史进步则重在时代精神。社会的发展指标主要是外在的,而历史进步的指标主要是内在的。社会可以是流水帐,但历史则不是。不是任何历史的东西都可以称为历史,只有那些体现着强烈印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信号”(非噪音)的东西才可称为历史。从这里可看出时代精神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这里除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外,还有“超时代”(真正超时代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只提出他们可以解决的问题)的一面,即新一代的特征虽被有些人发现,但上一代的延续并没有结束。当然,判断时代精神不能从一哄而上的热情中寻找,而应从冷静后的反思中得出。

博士生吴宁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她认为,“历史进步”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概念之间不存在分野问题。“发展”和“进步”是同一个概念,进步也是历史,衡量进步总是从历史过程考察,社会也是进步,是向着某些目标前进。如果硬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区分,那也不过是对二者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区分。一般来说,历史进步可侧重历时态的纵向的研究,社会发展可侧重共时态的横向的研究,但这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实际上历时态的纵向研究和共时态的横向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不能割裂。所以,无论从概念的涵义看,还是从研究方法看,都没有必要人为地制造出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汪信砚教授指出,研究历史进步及其评价尺度问题,确实需要首先明确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等这样一些概念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这两个概念有明显区别;社会发

展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指称的是社会或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客观上向着某种更高的目标的运行,这里的“更高目标”和它所相对的起点都可以表征为客观的甚至量化的指标体系,并且通过比较二者的指标体系,我们就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因而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发展状态总是某种描述的结果。社会进步则是一个评价性概念,它预示着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或客观事实与我们关于进步的某种价值标准符合一致,因而我们关于社会进步的断言实质上是我们的评价的结果。由于存在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人们对于同一社会发展过程是否意味着社会进步往往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因此,可以说,社会进步内涵着社会发展,但社会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与历史进步这两个概念的联系更明显一些。事实上,我们很难从内涵上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的区分。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进步(即按照唯物史观的评价标准来判定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量变还是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质变)无疑同样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形式。当然,二者的区别也还是有的,那就是两相比较,社会进步是一个局部性概念,而历史进步则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因此,也许可以说,社会进步是历史进步的实现形式,而历史进步则是一系列社会进步的时间串连和必然结果。

博士生导师欧阳康教授指出,在谈到历史进步及其评价问题时应注意到一些基本概念的辨析和界说。其一,进步通常是相对于退步或停滞而言的,分别描述事物的存在、运动和变化中的几种不同状态、趋势或过程性特征。只有那些在性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处于前进、上升、更新和发展的运动与变化才能叫做进步。因此,对进步的考察既需要绝对和确定的性质和数量标准,又需要相对的参照系统,二者相结合而成为我们所讲的评价尺度。其二,社会进步直接地是区别于自然进化而言的。自然客体具有价值中立性,对自然进化的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而社会事件普遍具有价值非中立性,不同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可能与同一社会事件处于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价值关系中,因此其认知和价值评价会有很大差异并甚至相反,出现社会评价中合理性并存的情况。应当注意到,相对性是社会评价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也是社会评价研究的突出难点之一。其三,社会进步和历史进步在其实际进程中是内在统一的。社会是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是社会的历史。既没有超历史的社会,也没有无社会内容的历史。相应地,社会进步是在历史过程中展开和实现的,展开了的社会进步叫历史。历史进步是以社会为内容的,历史是进步中的社会,二者之间不能实际地分离和割裂开来。其四,从认识论和评价论意义上,把社会进步与历史进步加以区分和分别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在于后者更突出强调并自觉运用了时间观念和时间方法。这正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区别之一。一般说来,社会学舍弃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和时代性差异而考察其共同的社会要素、结构和功能等,侧重于历史运动的共时态方面。历史学则关注不同时代特征的社会形态之间在要素、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特殊性、差异性等,侧重于社会运动的历时态方面。现代社会学和历史学则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向对方寻求方法论借鉴并与其相结合的欲望,以致形成了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历史学的新兴学科。过去我们较多地使用和研究“社会进步”概念,随着时间观念的强化和时间方法的突出,看来人类文明和文化进步与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更大空间范围和更长的时间过程中来加以研究和评价。这也许为对历史进步的专门研究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现代系统科学尤其是耗散结构理论中对时间不可逆性的特殊关注,以及法国现代史学研究中的年鉴学派提出的“长时段”理论等无疑可以给我们以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借鉴。

二、关于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与生产力标准问题

博士生袁银传发言指出,关于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是生产力标准;其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其三是把上述二者并列,认为二者都是历史进步的标准。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分歧,归根到底是由于对生产力及其标准的理解不同所致。对于生产力,既可以从静态的、客体的角度加以理解,也可以从动态的、主体的角度加以理解。从静态的、客体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生产力也即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从宏观的社会角度考察,生产力也即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财富,即国民生产总值—成本消耗=净增长。在这里,生产力标准也即是经济标准。有的学者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称为生产力决定论,然后还原成经济决定论,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力的。从动态的、主体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生产力也即人的本质力量、人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是人(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及其对象化。在这里,生产力标准也即人的标准,生产力标准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是一致的。如果按这种范式加以思考,与生产力相对应的范畴生产关系也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形式或方式,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源也就是人为了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在这里,便出现了主、客两种意义上的生产力标准之间的矛盾。客体意义上的生产力只是主体意义上生产力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或者说是最基本的一个方面、部分。可以说,人的经济活动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物质财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客体意义上的生产力,因而,客体意义上的生产力也就构成人的经济活动、社会经济进步的评价标准。但是,客体意义上的生产力并不构成人的一切活动(例如政治活动、文化活动、道德活动等)的评价标准,更不能成为整个社会历史进步的最高评价尺度和唯一标准。因为人们的政治、文化、道德等活动的价值目标并不是(至少不直接表现为)追求物质财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历史进步也并不只是表现为纯物质财富的累加过程。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和标准只能是综合的尺度和评价标准,是主体意义上的生产力标准,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

吴宁则认为,对于历史进步的评价标准仍然可以用生产力标准,但她强调,对生产力标准要作全面正确的理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是以人为主体的,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统一,生产力标准包含着两个相关的标准,即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当前存在着仅仅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经济发展的倾向,这是令人忧虑的。由于经济发展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来衡量的,单纯以经济发展作为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会有以下缺陷:其一,经济发展只反映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多,而不反映人们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快乐程度。其二,经济发展只反映产值数量的增加,而不反映产品质量。其三,经济发展只考虑经济盈利,而不考虑社会效益,生产过程及经济交往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人际关系的恶化等在经济增长中难以反映出来。这些缺陷在现实中也充分表现出来。现代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不能说它们社会发展程度就绝对高,而且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多社会问题反而突出,如空气污染、森林和耕地锐减、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人过度征服自然而恶化,人际关系也随经济的增长而恶化,人被物化、异化,成为商品、机器和经济运行中的螺丝钉和“单面人”。当然,这些缺陷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但这说明单靠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准是不够的。因此,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准的完整含义应是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

姚军毅认为,社会进步与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是有差异的:经济尺度、政治尺度、文化尺度均可构成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依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之不同,人们分别选取上

述某一尺度衡量社会是否实现了进步,都是可以的。而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则必然是综合尺度,因为要衡量的是总体活动方式,要比照的是不同的社会形态,任何一单方面的尺度都无法胜任。

欧阳康指出,如何评价社会历史进步,研究思路恐怕应当从单一绝对指标转向多因素有机组成的复合指标体系。人类社会是多种复杂因素有序结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组织系统。社会事件具有价值多元性、多样性、多层次性等。社会进步具有多阶段、多级数和内在不平衡性等,对不同的价值主体产生出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不可能用单一指标来做出全面的度量和评价,应当借助多种参照系从不同方面、层次、类别和阶段等各方面加以检测和度量,建立起多种评价尺度有机组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个指标体系或评价参照系统中,生产力标准无疑有其特殊的内涵和作用,应予充分重视。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而需要与其他多种指标相结合。

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

姚军毅明确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和标准。他认为,鉴于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所以,历史进步的综合评价尺度必须从人本身寻找。因之,并根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自身发展的终极追求,是唯物史观要达到的对世界之改变的最高理想,所以,历史进步的评价尺度只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汪信砚强调指出,不应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标准与我们通常所谓的生产力标准对立起来,也不应用其中一个否定另一个。因为一方面,当我们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尺度时,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怎样评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可以制订一个衡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如果这是可行的话,那么这个指标体系肯定需要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包括进来。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也并不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矛盾。虽然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但这有认识方面的原因(如现代的“全球问题”),也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如劳动异化)。按其本性和可能来说,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完全一致的。

欧阳康最后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以看作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目的和现实标志,但这里也应注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渐进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国度、区域中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具体内容,对它也还需要借助于各种具体的尺度来加以检测和度量,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建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尺度的综合性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责任编辑 彭昌林)